

院藏雕漆七佛偈鉢本事索隱

王崇齊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雕漆七佛偈鉢一件，周壁剔雕佛像七尊，並帶七佛偈語與佛號尊名，作工精美，信為清代乾隆時期之漆器佳作。此器曾於一九九四年「皇權與佛法——清宮藏傳佛教法器特展」中展出，當時伴隨出版的展覽圖錄，便將此雕漆鉢與乾隆四十二年班禪六世上進七佛唐卡之事作聯結，顯示此鉢不只是單純的工藝製品，其背後應有若干有趣的訊息尚待發現，供吾人繼續追索、探尋。今便由此雕漆七佛鉢之形式、風格切入，考察其相關由來，形塑其成做的可能脈絡，以為院藏雕漆七佛鉢之「本事索隱」。



圖一 清 剔紅七佛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緒論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雕漆七佛偈鉢二件，典藏號分別為中漆八九（圖一）與中漆九〇（圖二），兩者之大小、裝飾基本相同，皆為斂圓口，豐肩下斂，器壁上剔雕佛像七尊，每尊佛之上方各雕以楷字佛號尊名，右側則為楷字偈語，器下承附雕漆蓮座，兩者應是同時製作之物。典藏號為中漆八九之雕漆七佛偈鉢（以下皆簡稱「雕漆鉢」），曾於一九九四年「皇權與佛法——清宮藏傳佛教法器特展」中展覽

陳列；至於典藏號為中漆九〇者，則久貯於院內庫房，圖版未見發表。要到二〇〇六年故宮博物院進行第五年數位典藏計畫之際，因於器物處數位典藏子計畫執行院藏漆器數位化工作，個人才得與見此器之圖版，而對此器的好奇也由此而起。復因其時數位典藏子計

畫主持人陳慧霞副研究員善意大方地指引方向與鼓勵，建議筆者查閱清代乾隆朝內府工匠單位製作檔案《造辦處各作做成活計清檔》（以下簡稱《活計檔》），並配合其他類似器形之比對，應可理清此物之眉目。也因為如此，個人持續關注此論題，乃至有此文的



圖二 清 剔紅七佛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寫成，在此謹申謝忱。然經翻閱清高宗在位六十年間之《活計檔》載記，雖有「漆佛鉢」之登載，但對照前後文，個人以為應是書寫之際的誤「七」為「漆」，除此之外，並未見隻字片語提及「雕漆鉢」之成做。但《活計檔》中卻載有其他類似形制鉢器製作的資料，對理解院藏雕漆七佛鉢有相當的助益。則在直接相關文獻的缺乏下，仍可透過對其風格、形式的討論，考察「雕漆鉢」成做由來，將「雕漆鉢」納入適當脈絡框架中，促進吾人對此一院藏器物的瞭解。

從七佛偈到七佛：七佛偈鉢的確立

所謂七佛，一般指過去七佛，亦即毘婆尸佛、尸棄佛、毘舍浮佛、拘留孫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葉佛，以及釋迦牟尼佛。世亦傳有七佛偈語，且早在宋代，大書法家黃庭堅（一〇四五—一一〇五）便曾書寫七佛偈（圖三），是

作用筆長槍大戟輻放於外，字架寬綽大方而見顏真卿影響，風格可與蘭千山館所藏《發願文》相接，故今雖僅見拓本蛻影，相信並非是件無所根據的製作。此作幾經傳藏，在清代



圖三 明代《玉煙堂帖》刻收之黃庭堅《七佛偈》拓本（部分）

被收入大內，清宮典藏佛教書畫目錄《秘殿珠林》有「宋黃庭堅《書七佛偈》一卷」的登載，另同書不但載記清高宗曾於乾隆九年（一七四四）臨寫黃庭堅此卷，甚至內府還收有乾隆皇帝所書七佛偈墨拓五十卷，在在顯示清高宗對於七佛偈的內容與意義，應有一定程度的熟悉。這份熟悉，或即乾隆皇帝著令匠作刻七佛偈本文於鉢上的遠因。只是，這樣的推論，還需進一步的考察來連結、支撐。特別是乾隆皇帝何以只將七佛偈刻於鉢上，而未見施於其他器類呢？此事的解答，正在清高宗的第二次南巡之行中。時當乾隆二十二年（一七五七），乾隆皇帝遊覽蘇州開元寺，並索觀該寺收藏的古鉢。此鉢之由來，可見於唐人皮日休〈開元寺佛鉢詩〉與詩序，乾隆皇帝初見此鉢的吟詠，顯示他對此鉢來歷了然於胸，《御製詩集》二集卷六十九載云：

開元石像鉢，云自海中

浮，銘紀簡文帝，序傳皮日休，偈如演七佛（清高宗夾註：「鉢上有七佛」），境即是三洲，擬上度經閣，因之縱遠眸。

不僅如此，他還立即交辦下屬照此鉢樣式成做，事載同年之《活計檔》：

本年二月二十三日，蘇州行宮交出開元寺古鉢盂一件。傳旨：「著尋廣榔木照樣做一件，欽此。」

（六月·行文）

自此之後，乾隆皇帝還用沉香木、伽楠木、檀香木、和闐玉來製作類似形制的鉢器，這種跨越材質複製同式器的作為，在乾隆內府的工藝製作並非異數，但當鉢上有七尊佛像的鉢形器式，因而被引進乾隆內府的工藝系統之後，同是器上雕作七佛的「雕漆鉢」，應該是這種脈絡下產物。

然而，若再細細體會前引乾隆詩中「偈如演七佛」一句，則開元寺古鉢上未必有七佛偈語於其上，只是清高宗個

人單方面將七佛偈語與開元寺古鉢上的七佛作連結。今對照其他文獻與實物，便更能確認筆者推論。如《御製詩集》五集卷二十七所載，清高宗詠和闐玉七佛鉢而述及開元寺古鉢時有言：

因以伽楠重肖刻，佛號佛偈明鐫題。無號為空稱號有，有空於佛胥弗取。乃今並偈各註明，此義與佛差別否。

七佛明明各為偈，由來一字不曾云。

復次，乾隆二十二年《活計檔》載云：

蘇州行宮交出開元寺古鉢盃一件。傳旨：「著尋廣榔木照樣做一件，欽此。」當即尋覓廣榔木，因產在粵省，蘇州無此材料，隨用沉香照式成做。……欽遵今已做得沉香鉢一件，隨黃楊木座，一並恭繳。其杭州木料業已差人赴粵購買，買得時另行照做呈進。……於

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，郎中白世秀、員外郎金輝將蘇州織造安寧送到廣榔木鉢一件，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。奉旨：「留下，欽此。」（六月·行文）

由此詳細載錄，可知乾隆皇帝原意以廣榔木複製開元寺古鉢，但卻先收得沉香鉢，要等到乾隆二十三年，蘇州複製成做的同式廣榔木鉢才被送到宮中。此間經緯關連，或可解釋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棕竹題詩七佛鉢上刻清高宗詠「伽楠木」詩作的原因（圖四，筆者對此鉢材質有不同意見，見後文，但為避免混亂，品名姑依其舊）：蓋伽楠木為沉香的一種，乾隆皇帝先見沉香木鉢而詩詠之，後蘇州送到廣榔木鉢，他便將該詩刻於這一原先屬意的木鉢之上，或因廣榔木質地與竹質形貌相近，北京故宮博物院才誤判廣榔木為棕竹。總而言之，此棕竹題詩七佛鉢顯然是最忠於開元寺古鉢

形貌之器，而其上只有七佛而無偈語尊名，正可確認筆者以開元寺古鉢上原無文字雕作的推測。

因此，「雕漆鉢」的成做樣式雖是自開元寺古鉢而來，但其上的佛名尊號與七佛偈語，卻是乾隆皇帝參與此器製作的跡痕。換句話說，「雕漆鉢」的成做與產生，不但需要開元寺古鉢因子的存在，還有待乾隆皇帝的參與方能成事，其製成時間自不能早於乾隆二十二年，此正為「雕漆鉢」的「本事」之一。

法顯法師的原物：七佛偈鉢樣式的擇取

一如前言，乾隆皇帝取觀開元寺古鉢之後，便製作多件同式的鉢形器，如頤和園舊藏之青玉佛鉢（圖五），以及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紅木雕七佛鉢（圖六）、棕竹題詩七佛鉢（圖四）、白玉染色過去七佛鉢（圖七），若將之與「雕漆鉢」癩祭並觀，便會發現其



圖五 頤和園舊藏青玉佛鉢



圖四 棕竹題詩七佛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白玉染色過去七佛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紅木雕七佛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外形雖同，但器口略有斂圓口與直口之別，這種外形上的差別，或許是「雕漆鉢」另一尚待索隱的「本事」。再者，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棕竹題詩七佛鉢（圖四）與白玉染色過去七佛鉢（圖七）器內，均刻有清高宗御製詩，詞句內容直指此二器與開元寺古鉢的高度關連，且二器皆為直口，那麼，這種器形上的相異，也就不能等閒視之。今欲明其事，仍須回到乾隆皇帝取觀、複製開元寺古鉢之事。乾隆二十三年（一七五八），清高宗〈題伽楠木佛鉢〉之詩註云：

開元寺佛鉢見皮日休詩序甚詳，去歲（一七五七）南巡，索觀題句，仍命藏寺中。愛其製古，因命良工以伽楠香木肖形為之。然日休所云帝青石作，以今觀之，則陶器而非石，蓋世代屢易，焉知不出於贗，故末句及之。

此言開元寺古鉢因非帝青石質，故非唐代皮日休所見原



圖八 青金石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物。再檢皮日休〈開元寺佛鉢詩〉，確有「帝青石作綠冰姿，曾得金人手自持」之句，則乾隆皇帝雖「愛其製古」，仍就偽者複而製之，但是熟知典故又愛附和典故的他，所見開元寺佛鉢並非帝青石所製，大概不能不引為缺憾。後乾隆

皇帝兩度以和闐玉重作七佛鉢時，雖用一種寬待的態度敘述文獻與實物的相違，其實仍不忘開元寺古鉢在材質上的缺失：「帝青石鉢日休詩，開元寺藏久然疑」、「開元鉢匪帝青石，皮日休言何所聞」。這種心態，長於體察聖心的臣子應該略有所感，當然也會尋找適當的時機來表現。《御製詩集》二集卷八十三所載，便是臣下上進「帝青石鉢」後，乾隆皇帝的欣喜自得之作：

皮日休開元寺佛鉢詩序舉《法顯傳》以為據，今開元寺雖有其鉢，而非帝青石也。徒以皮序有佛像見於外之言，乃刻佛像於外，以附會其說，向曾辨其謬矣。近因蕩平準噶爾，於其部落得佛鉢一，則真帝青石也。質古而色潤，其為調御所持無疑。蓋昔年準夷掠西藏所得，與《法顯傳》所云：「若千百年當復來中國」之語適相符合，既愜法

緣之喜，因廣襲美之章：「豈藉雕鏤七佛姿，天王獻此敬擎持。舍婆城受觀拏日，化樂宮餐烏哺時。托去不教諸慮染，置來惟許四禪知。波旬國土寧應有，飄至祥風法雨吹。」

而院藏恰有青金石鉢一件（圖八），器壁便刻有此詩，另其上還刻列滿文、蒙古文、藏文共四種文字，經由莊吉發教授的釋讀，確認其語意與漢字所書相同，且蒙文為托忒蒙文，也非後世有能力偽造。因此，乾隆皇帝文中所述之帝青石鉢，應該就是院藏之帝青石鉢。只是，青金石鉢之上既光素無紋，其形制又常見於唐卡之中，可說無甚特殊之處，乾隆皇帝面對這一鉢器，就面臨了如何處理開元寺樣式古鉢的難題。對此文獻雖未有載錄，但筆者以為，「雕漆鉢」有別於開元寺古鉢的斂口樣式，正是受到帝青石鉢口圓斂的影響。一如清高宗將七佛偈語與佛號尊名加於內府製作的七佛

鉢器之上，「雕漆鉢」的斂口形制，正為乾隆皇帝揉合開元寺古鉢與青金石鉢的實物跡證，環繞在法顯法師、皮日休、開元寺古鉢間的依違，便得以統合在「雕漆鉢」中，這是「雕漆鉢」隱藏於形制間的「本事」。

班禪六世喇嘛進貢七佛唐卡：七佛樣式的變化

討論過「雕漆鉢」的斂口形制與器壁文字後，「雕漆鉢」的成做脈絡便逐漸清晰，但這些七佛鉢器之間，除文字刻作與形制有所差別外，其鉢上佛像也可大別為兩種。其一為七尊佛像手印均同者，如與開元寺古鉢樣式最為接近的棕竹題詩七佛鉢（圖四）、院藏類似形制的玉七佛寶蓮佛供（圖九，典藏號：故玉



圖九 玉七佛寶蓮佛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3519），以及白玉染色過去七佛鉢（圖七）^{〔註一〕}；其二則以「雕漆鉢」與紅木雕七佛鉢（圖六）為代表，其鉢上七佛手印不一，顯與前者手印齊一不同。考察相關文獻，使內府七佛圖像樣式發生重要變化的事件，很可能是乾隆四十二年班禪六世上進七佛唐卡之事。當乾隆皇帝收到班禪喇嘛所進之七佛唐卡時，他並未能分辨唐卡圖像所指即為過去七佛，但在諮詢章嘉國師後，便瞭解此圖像之由來，乾隆皇帝對此七佛唐卡甚感興趣，隨即將此章嘉國師索查之資訊與七佛圖像併刻於碑，摹拓以廣流傳，其事俱見清高宗《御製文集》二集卷三十〈七佛塔碑記〉與今存七佛拓本背後之白綾籤（圖十）。除此之外，乾隆四十三年《活計檔》載清高宗以「七佛偈」一張賜贈達賴喇嘛（正月·記事錄），由於這是乾隆皇帝賞賜達賴物品中少見的品類，復又接近七佛塔碑成立的乾隆四十二年，故推測



圖十 七佛塔碑拓本後之白綾籤



圖十一 清 利益金鑲七佛海螺、利益七佛白海螺、催生石海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此處所載「七佛偈」即是七佛唐卡上碑後之拓本。附帶說明的是，以「七佛偈」代替七佛圖像之稱語亦見他例，如乾隆四十六年《活計檔》載：「九江關送到磁佛七尊，係照七佛偈燒造」即是（閏五月·記事錄）。此外，觀察院藏清（利益金鑲七佛海螺）、（催生石海螺）

（圖十一），其七佛手印樣式皆與七佛唐卡碑拓本全同，甚至瀋陽故宮博物院所藏之紅木鑲招絲珞珈七佛屏風，其上七佛、侍者、神足、圖式、配置，皆是七佛唐卡碑拓本影響下所成做之物。（註二）乾隆五十一年《活計檔》更載：「鄂魯里交檀香鉢一件，傳旨：『交啟祥宮，照漆（七）佛偈海螺手印作，欽此。』」（十二月·如意館）可見在此碑做成之後，其七佛手印樣式，對乾隆朝內府七佛圖像傳統影響甚鉅。一九九四年「皇權與佛法——清宮藏傳佛教法器特展」之展覽圖錄將「雕漆鉢」與此事作連結，也是理所當然之事。

只是，同為清宮舊藏的「雕漆鉢」（圖一）與紅木雕七佛鉢（圖六），其不但形制類似、裝飾相同，連七佛手印樣式也相同，已顯示兩者製作脈絡的相近，而將其手印形式與七佛唐卡碑拓本相較（圖十二、圖十三），就會發現兩

者手印樣式有所差異，其中雖有手印同式者，亦有手印相異者，從開元寺古鉢到「雕漆鉢」間，其由手印均同轉為手

印各具殊貌，就不是班禪六世上進唐卡事件所致。然此中關節，或因文獻無載，或以筆者查索無方而未見相關史料，對

此論題的考察只能於此止步。惟檢乾隆二十二年《活計檔》所載，或許與此相關：

胡世傑交沉香鉢盂一件、



圖十二 「紅木雕七佛鉢」、「七佛唐卡碑拓本」第六迦葉佛手印對照圖



圖十三 「紅木雕七佛鉢」、「七佛唐卡碑拓本」第七釋迦牟尼佛手印對照圖

廣榔木兩根。傳旨：

「短些廣榔木著依木頭做鉢盂，沉香鉢上佛像

不好，著喇嘛另畫像呈覽……」……員外郎金輝

將木鉢樣一件，上貼喇嘛擬畫得七如來佛樣七張

（九月·油木作）

由於此次改繪圖像乃是由喇嘛成做，且明記喇嘛所畫為「七如來佛像」，對深處宗教之中的喇嘛而言，七佛的手印很可能是其辨識標誌七佛的依憑之一，而「雕漆鉢」與七佛唐卡碑拓本手印異中有同的狀況，或正是皆源出西藏而在傳播有所分歧所致。但不論如何，「雕漆鉢」的成做脈絡不待班禪進獻七佛唐卡而成立，若再考慮七佛唐卡進獻後的巨大影響，並使附會源出〈法顯傳〉的鉢上七佛，逐漸與藏傳佛教鈎連，而出現在藏傳佛教法器之上，則「雕漆鉢」成做的時間，非必要在乾隆四十二年以後，而且很可能製作於乾隆二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二年之

間。此則其「本事」之三。

結語

經由文獻與實物風格、樣式間的梳理，「雕漆鉢」的成作脈絡便稍見顯明。因為這些漸次明顯的脈絡，也反饋了「皇權與佛法——清宮藏傳佛教法器特展」策展者鑑歸此器成做於十八世紀的可信度。再者，存世以七佛為裝飾主題的鉢形器，並不只限於本文所引所述之樣式，如前舉院藏玉七佛寶蓮佛供（圖九）的成做，似與「雕漆鉢」的成做脈絡相關，但其不取雕七佛偈本文的詳情為何？另其置七佛於蓮瓣形開光中的作法，是工匠的創發，抑或另一套成像系統所致？即便是筆者所述論鉢形器，其成做與圖像特徵，也有待與《活計檔》載記作更細緻的比對，如乾隆三十八年《活計檔》有乾隆旨意：「著交蘇州織造舒文處成做，隨木鉢一並發去，其欲玉鉢上佛要比木鉢上佛厚起分來，欽此。」

（十月·行文），或與頤和園玉鉢佛像雕作較為外凸的狀況相應合（圖五），若是如此，「雕漆鉢」佛像較棕竹題詩七佛鉢要外觀的狀況，樣式便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特色。凡此種種皆有待考察、澄清，甚至是架構出另一條新的成作脈絡，那麼，其他傳世七佛鉢以及相關器式的成做、由來、乃至於製作年代，也許都能獲得解決。一同成為觀察、切入乾隆朝工藝製作與風格取向的門徑之一。



本文的完成得力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數位典藏計畫的協助，故本文實為該計畫執行成果的一部份，謹此申謝。

作者為本院器物處研究助理

註釋：

1. 就圖版所見，此鉢器壁上之佛像七尊樣式似皆相同，但筆者所見圖版僅示此鉢之一面，仍需更好的圖版來佐證。
2. 圖版見《瀋陽故宮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：琺瑯卷》，瀋陽：萬卷出版，二〇〇七，頁二〇一—二一三。